

《申報》所見的兩則香港史研究資料

林國輝
香港史研究者

《申報》創刊於1872年4月30日，是上海第二份中文報紙，¹時間晚於香港的《遐邇貫珍》（1853年創刊）、《中外新聞》（1858年創刊）和《華字日報》（1864年創辦），但其創辦過程卻與香港有密切的關係。首先，英商美查（Ernest Major）在決定辦報後，曾派錢昕伯到香港向王韜學習，王韜當時在《華字日報》工作，錢與王在上海時已相識，後更娶王氏女為妻。²《申報》在創辦之初，就以「本報自述」形式來介紹《華字日報》，盛讚該報成績可觀，特別提到主筆黃勝和王韜才華出眾。³

其次，《申報》在創刊首日，即選譯香港「三月十九日新報」消息，實為廣東新聞兩則，⁴早期香港報紙所刊載的「中外新聞」，除了報導外國大事之外，還涵蓋香港及鄰近廣東地區的消息，轉載香港報刊的內容，表明《申報》博採外地消息的立場。⁵

《申報》創刊初期主筆錢昕伯既為王韜女婿，王氏在香港創立《循環日報》時，《申報》亦作報導，日後更經常選錄《循環日報》的論說，兩報社論間中亦有互相呼應。⁶隨著分銷網擴張，《申報》於1881年已在上海以外的十七處地方（包括香港）設有「訪事員」，⁷香港的消息可從《申報》上讀到。

香港華文報紙雖然早於19世紀50年代創刊，但歷經戰亂、報館興替和各種災變，現存早期報刊資料缺失甚多。就以《華字日報》為例，該報館於1894年時曾經歷火劫，「舊存報紙，盡遭焚燬」。⁸香港大學圖書館現只存1895年1月以後的《華字日報》，但脫期嚴重，而早期的《循環日報》亦只收藏1874年至1886年的部份期數。相反《申報》的保存情況則較為理想，大部份印行的《申報》仍有影印本或微縮膠卷傳世，其中轉載香港早期報紙的內容雖然不多，但卻彌足珍貴，為我

們了解香港社會發展的情況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。以下兩則原見於香港《華字日報》的新聞，就是其中的例證。

例一：〈將軍澳罷市（選錄香港華字日報）〉，
《申報》，1874年2月26日。

距港之東有將軍澳者，一小村也。土人負販其間，漸成市廛，近來諸物雲屯，頗稱暢旺，朝廷立有營汛於此。設官守土，職有專司，邇日粵海關部派有巡船至此緝查。蓋以防商船估帆，道經其地者，或有偷漏也。是亦重國課之一道。前日傳聞其地商民有停止貿易之說，則以輯私人苛索漁船陋規也。先是其地多業漁者，烟蓑雨笠，戴月披星，寄以一葉孤舟，出沒淇波巨浪間，緝私差役恆至，索其供養母，每艘收取銅錢二百八十枚，幾於家喻而戶曉，有所得藉以飽貪囊，適者有新至一漁船，不知其弊，差役至索，置著罔聞，以為釣月鈞雲，得魚換酒，乃世外生涯耳，豈有餘錢供人揮霍哉。且我輩中有逼於窮乏者，方且衣食無從為計，妻女飢號，塞之不暇，乃欲割肉醫瘡，以應汝求，差役怒甚，以為汝何人，斯敢與我抗，于是斥糶詈不已，又從而笞撻之，漁人飲泣不敢校，商民見之，大為不平。其地有凌姓設帳授徒者也，耳其事出，而為之排解，差役遷怒於凌，逐肆毒毆，凌負傷頗劇，旋差役又繫以鐐銀，凌當時欲思控官，驗傷以憑存案，而身為差役所羈，苦不得脫，如鳥在籠，如猿在檻，其苦萬狀，被禁凡閱四日。商民聞之，不禁攘臂奮及，咸曰：是風烏可長

也。於是其市遂罷，凌乃得出，後凌以事顛末控官，官但加以撫慰，而事卒未辦。既而凌姓迭控於九龍司，新安令，復赴省上訴於府，尊太守以為如果屬實，自當徹底根究，而其事必由司官邑令，為之上詳，方可明白，勢不能越控也。越控即與健訟等。且事關地方公憤，眾民皆當聯名具稟，職司撫馭者當必為之保護。惟近日緝私差役，往往倚勢作威，妄行漁利，譬諸良民乃魚肉也。彼乃刀俎、吸髓、敲膏，無所不至，為上者，苟能盡心於民事，自宜亟為之伸枉理屈，挫梗安良，毋使此輩得行其鬼域，況其地距港不過咫尺間，倘消息傳聞，徒足貽笑西人耳。⁹

史料價值：

例一所提及的「將軍澳」位於香港之東，而且在新安縣境內，應是指九龍半島東面的將軍澳。明朝萬曆年間（1573-1620）《粵大記》的〈廣東沿海圖〉及萬曆九年（1579年）的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，均在「官富巡司」（當時香港地區的行政機關）附近記有將軍澳一地，後者清楚表示其地正對佛堂門，與今日將軍澳的地理位置相符，又註明「將軍澳可避颶風，至龍船灣半潮水，至擔竿州二潮水，至淘潭口一潮水。」可知當時將軍澳已是往來船隻停泊避風的港灣。清代中葉以後的中外地圖，亦多標有將軍澳一地，包括繪於1840年前後的中國海防形勢圖¹⁰、1868年「新安縣全圖」¹¹、1895年哥連臣地圖修訂本¹²及1897年《廣東通志》內的地圖¹³。

最近二十年，將軍澳經填海後，已開發為一個新市鎮，如果要了解將軍澳地區的歷史，只可參考地區組織出版的刊物，例如《西貢風貌》¹⁴、《西貢歷史與風物》¹⁵及《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》¹⁶。其中《西貢歷史與風物》一書，透過訪問及碑銘資料，查明在19世紀後期，將軍澳的坑口村已經發展成墟市，憑藉水陸交通網絡的優勢，漸成為地域中心和市場中心，但墟市的名字未見於嘉慶年間編修的《新安縣志》，所以該書認為墟市的

興起，是在香港成為殖民地後，港島人口遽增，對漁穫和柴草等物資需求增加，才促進了坑口墟的發展。¹⁷這與例一所引的內容亦相符合，所謂「近來諸物雲屯，頗稱暢旺，漸成市廛」，將軍澳地區的墟市應是1870年代初才開始出現。將軍澳村位於坑口村以北的，但現存資料未提及將軍澳村曾建有墟市，¹⁸從實際地理位置及碼頭設置等考慮，坑口比將軍澳的水陸交通更為便利，所以該墟市應為「坑口墟」無疑。

將軍澳早於明代已為避風港，例一亦記：「先是其地多業漁者。」1889年張之洞《廣東海圖說》中談到「九龍寨」佈置時，亦特別提到「本港無漁船，惟附近將軍凹有漁船十餘號」。¹⁹可知清朝時該地為漁船的理想停泊處，今坑口天后廟旁仍存有大井一口，相傳為昔日漁民汲水之處。然而從例一引文所見，當粵海關在區內增派緝私人員時，這些漁戶卻慘成巡艇丁兵的剝削對象，並向每只漁船徵收二百八十錢。

清代同治年間，駐港官兵主要由鎮守九龍寨城的大鵬協水師副將統帶，左營中軍駐大鵬城內，右營守備駐東涌，兩營下屬汛兵分守各處，並協助海上巡邏。²⁰香港割讓後，境內走私鴉片問題嚴重，為此兩廣總督瑞麟允許運載鴉片的民船於東莞、香山等地繳納厘金後轉銷內地，並於1868年在香港東西兩面水域的長洲及佛頭洲設立厘卡，加派駐蒸汽巡艇，專責徵收鴉片厘金和加強緝私工作。²¹1871年6月粵海關監督亦參照同樣佈置，在香港水域的佛頭洲、汲水門、九龍城及長洲設立稅廠，向中國貨船徵稅，並備有新型緝私船，打擊走私漏稅。²²

清廷緝私人員在香港水域附近截停中國船隻，原只對未完稅的貨品及鴉片徵稅，但後來變成無論是外省至港貨輪，還是香港至澳門的船隻，皆向其強徵貨稅。²³巡艇對往來船隻的騷擾，早引起港督麥當奴（Sir R. G. MacDonnell）及港商不滿，並要求英國政府正視這個影響香港商貿的問題，與中方交涉。²⁴這就是政府檔案中提到的「封鎖香港」（Hong Kong Blockage）事件，擾攘近二十年，直至1887年厘卡由總稅務司管轄下的海關接管後，事件才告一段落。²⁵

例一所提到的「營汛」，可能是指1871年後進

駐的緝私兵丁，坑口天后廟內1876年重建碑記亦有「將軍澳汛千總李弼臣助銀伍大員」²⁶的記載，但考境內其他碑銘及同治年間的《廣東圖說》，皆沒有「將軍澳汛」的布置，²⁷結合碑銘與例一的記載，這個「營汛」應是為配合緝私而在1871年後建立。然而在英國檔案裏，這些兵丁時有強行充公船隻，或插賊誣巖之事，藉機中飽私囊。1883年勞士法官（Mr. Justice Russell）給港督寶雲（Sir George Bowen）的報告中，就把清廷巡丁描述得如同強盜，並列出漁艇被充公的個案，說明「封鎖香港」的遺害。²⁸例一則從另一角度，暴露駐軍紀律不嚴，魚肉鄉民的劣行。

當日將軍澳居民對緝私差役的不滿，更觸發罷市抗爭。先是漁戶拒不納款，而飽受拳腳之苦，商民已感不平，後來凌姓私塾老師為漁民排解而遭巡勇痛毆，銀鐺入獄，引發商民罷市，一時民氣沸騰，終使凌姓老師獲釋。文中說到這位私塾老師被拘留四天，釋放後往「控官」，但對方要求息事寧人，於是先後到九龍司、新安縣令作控訴，皆未獲受理，故最終要上訴到廣州府，但又被指為「越控」而不被接納，而且威嚇他「越控」等同「健訟」。根據嘉慶二十年定的律例條文：「生員不守學規，好訟多事者，俱斥革。按律發落不准納贖」，²⁹刑罰頗重，可見地方官皆不想審理此案，並作出威嚇。從這個案例可知，境內海關巡丁得到地方官的包庇，益使他們橫行無忌，而這段有關九龍居民罷市抗爭的記載，不見於過去選編的香港史料，值得注意。

例二：〈記香港醮會（選錄香港華字日報）〉，
《申報》，1872年9月5日

港地連日醮會之舉，恭迎列聖鑾輿，鎮遊街巷，絲竹管絃之盛，則有洋洋盈耳之笙歌，衣冠錦繡之儀，則為落落大觀之人物。二龍飛舞，將欲躍淵見田，五鳳跨遊，恒願凌霄接□。□歷紫薇之巷，燕舞翩翩，東過蘭桂之芳，馬騰簇簇，旌旗歷亂，真堪耀目炫神，翡翠迷離，亦足賞心快志。又況會□花果，盤設孟蘭，宣佛法於無邊，啟壇

場之浩蕩，結若蜃樓，不少繭絲蟬殼，幻成海市，居然萬戶千門，鶯院花香，宏招蝶使，法場善廣，遍誦菩提，羽衣則說道德之言，五千一貫；比丘則證如來之法，萬億歸虛。奪目張燈，風來則有聲鏗鏘爾，迎神結彩，雅化則靜寂肅然，將見識六如之道，咸登歡喜之鄉，空三昧之心，眾拔憂愁之國矣。○本港賽會之設，有以稚年小子，巧裝昔人故事，使之騎馬遍歷街衢，以為樂趣者，殊不足觀。況當炎天赤日，煩苦備至，在彼小子，實有慘不可言，乃父若兄，又何忍樂而為此風會之陋習，真可怪哉！

史料價值：

例二首段用駢文格式寫成，詞藻華麗，語意較隱晦，但所記為1872年香港孟蘭醮的情況，其中包括有神輿行列出遊，穿街過巷的情景，亦提及到誦經超幽的宗教儀式，與今日孟蘭節的基本內容相同。太平山的孟蘭勝會似早於1856年已舉行，³⁰隨著19世紀70年代本地華人社會日漸壯大，經濟發達，節日慶典亦愈見規模，且耗費甚巨。王韜旅居香港近二十年，對當時孟蘭節的各項安排亦留有深刻印象，所謂「孟蘭盆會盛行於今而莫知其所自始……以近今各處，所見之最盛者，莫如粵東。以香港蕞爾一區，每歲舉行是會，約費萬金，裝嚴炫麗，莫與為比，斯楊盈川之賦所不能形容者也。司事者，捐集各行鋪戶之銀，歲必盈一萬四、五千金，盡以供裝嚴，其捐之大小，以送燈多少別之，首選者，所懸之燈自屋至地，輝耀街衢者以為榮，此習俗使然也，以一孟蘭會，揮手千金，嘻！可謂豪舉矣，然謬亦甚矣！」³¹

香港與上海同樣有大量外地移民，農曆七月旅居上海的廣東商人亦會辦孟蘭盆會，耗費甚巨，同樣成為《申報》的新聞內容：「本埠每屆中元令節，閩、廣、寧、紹各幫，均設孟蘭盆會，熱鬧異常，茲以邑尊早經出示禁止，誠恐人多易於茲事也。然各幫仍照舊例，即如新聞之廣東會館，所設之會極形華美……并恐或有失慎，預設洋龍數架，

先事防閑。往觀之人，靡不摩肩擦背。」³²地方官員禁止市區內舉行傳統慶典，深怕好事之徒，乘機聚眾生事端，但主事者依舊大事鋪張，民眾則熱烈參與，這與官方謹慎的態度，造成強烈對比。正是這種反差提供一個討論空間，而孟蘭盆會這類民俗活動，亦得以佔據上海及香港報刊的版位。

報刊上的民俗資料，對於我們了解昔日的都市風情，大有幫助。特別是討論地方風俗傳承時，這些文字記載，又成爲口述歷史資料以外的根據。就以香港銅鑼灣潮洲公和堂的孟蘭勝會爲例，首屆法事據說在1897年舉行，³³筆者暫時仍未見到相關的文獻資料。不過上引王韜對孟蘭盆會的論述，則早見於1875年所刊行的《甕牖餘談》，當日會場可能設在中、上環一帶。與兩者相較，例二所引《申報》的報導，是目前爲止最早關於香港島上孟蘭盆會的中文記載，說明同類民俗活動，至少在香港市區已經流傳達135年。

例二末段關於「扮色」的記載，同樣具有相當參考價值。清代廣東地區多個縣市皆有以兒童裝扮色的風俗，其中包括佛山、香山及東莞，³⁴惟獨未見於《新安縣志》。長洲飄色據說要到1930年代末才成爲太平清醮巡遊的一部份。³⁵不過從

這段文字可見，一種類似「地色」的活動，早於1870年代，已成爲迎神賽會的一部份，但「扮色」的孩童並非被抬在轎上，而是騎馬出遊，不過採訪者的角度，仍然是烈日之下出游，孩童需要忍受痛苦，與今日的報導手法相類。

關於香港地方風俗的源流，往往憑當今主事人的記憶，或依靠文人筆記、碑銘資料和官方檔案內零星資料，才可得知其點滴。早期的報刊的記載，實在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。

《申報》自1872年4月30日創刊，至1945年5月27日終刊，橫跨大半個世紀，1984年上海書店曾整套影印出版，合共四百冊。後來廣東檔案館選輯其中有關廣東、港澳、桂東、湘南、贛南及閩西的內容，編成《〈申報〉廣東資料選輯》³⁶，一套共十七冊，收集範圍包括香港新聞，給香港史的研究者帶來不少方便。如要利用《申報》內有關香港的記載，這套資料自然成爲最便捷的工具書，但其中仍有不少遺漏，例如上引「將軍澳罷市」一文，就未被收入。加上原書卷秩浩繁，選輯過程中誤抄錯植，亦在所難免，使用時要倍加留心。據知上海書店已決定重印《申報》，或可於2008年推出，如果能同時推出電子版，相信更能發揮《申報》的功用。

註釋

¹ 徐載平、徐瑞芳，《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3。

² 同上，頁24。

³ 〈本館自述〉，《申報》，1872年5月8日。

⁴ 《申報》，1872年4月30日。

⁵ 徐載平、徐瑞芳，《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》，頁8。

⁶ 〈書《申報》中輿論後（選錄香港《循環日報》）〉，《申報》，1874年11月28日。

⁷ 徐載平、徐瑞芳，《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》，頁58。

⁸ 原見陳止瀾《〈華字日報〉七十一週年紀念刊》，今轉引自李谷城，《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25。

⁹ 爲方便閱讀，例一及二之原文皆由筆者標點。

¹⁰ 哈爾·恩普森（Hal Empson）著，《香港地圖繪製史》（香港：政府新聞處，1992年），頁102。

¹¹ 同上，頁114-115。

¹² 同上，頁136-137。

¹³ 同上，頁117。

¹⁴ 《西貢風貌》編輯委員會編，《西貢風貌》（香港：西貢區議會，1995年）。

¹⁵ 馬木池等編，《西貢歷史與風物》（香港：西貢區議會，2003年）。該書第二部分第二節以〈從坑口墟到將軍澳新市鎮〉爲題，介紹19世紀以來將軍澳地區的發展歷程。

¹⁶ 《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》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》（香港：坑口區鄉事委員會，2007年）。

- ¹⁷ 馬木池等編，《西貢歷史與風物》，頁56。
- ¹⁸ 將軍澳村的歷史參見B.V. Williams, "The Chan Family of Tseung Kwan O", in *Journal of Hong Kong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*, Vol. 7 (1967), 158-159. 但由於族譜等文獻資料缺乏，這篇短文主要根據訪問資料寫成，其中提到將軍澳村陳德亨（1828-1891）曾在佛山開店，並擁有一艘往來九龍及佛山的貨艇，曾協助興建坑口碼頭。而根據1905年的土地登記，他的兒子陳惠堂（估計生卒年為1872-1933年）在坑口則擁有四間店舖及一間屋。2008年初該村父老陳友根先生與筆者傾談時，亦表示從未聽聞將軍澳村曾建有墟市，反而表示村外水淺，難以停泊船隻，過往漁船都集中在坑口。
- ¹⁹ 張之洞著，《廣東海圖說》，頁28-32。現轉引自馬金科，《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54。
- ²⁰ 桂文燦纂，毛鴻賓、郭嵩燾等修，《廣東圖說·新安縣圖》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7年），頁154-155。
- ²¹ 陳新文，〈「封鎖香港」問題研究（1868-1886）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，2003年，第1期，頁173-191。另見Memorandum on the "Hong Kong Blockage"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vernor Sir George Bowen, G. C.M.G. (26 August 1883) by Mr. Justice Russell.
- ²²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，《九龍海關志》（廣東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67。
- ²³ 〈西人論粵垣巡船之非〉，《申報》，1874年8月15日。
- ²⁴ 〈論香港緝私事〉，《申報》，1874年6月24日。
- ²⁵ 九龍海關編志辦公室編，《九龍海關志》，頁68。
- ²⁶ 《香港碑銘彙編》誤記為：「營將軍澳況千總李弼臣助銀伍大員」。
- ²⁷ 同治年間新安縣的營汛，包括鹽田、沱灣砲臺、大鵬城、九龍砲臺、佛堂門、糧船灣、九龍海口、瀝源港、塔門、九龍寨、石筍砲臺（即汾流）、深水埗、大嶼山、青龍頭、長洲、青衣、東涌、坪洲、蒲臺、沙螺灣、大濠、急水門、梅窩、榕樹灣等處。見《廣東圖說·新安縣圖》，頁154-155。
- ²⁸ Memorandum on the "Hong Kong Blockage"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vernor Sir George Bowen, G. C.M.G. (26 August 1883) by Mr. Justice Russell. 「封鎖香港」的詳情，可參看G. B. Endacott, *A History of Hong Kong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4), 188-195 & 213-214. 除上引陳新文著作外，另可參看劉存寬，〈19世紀下半葉的九龍中國海關及其交涉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，2003年，第1期，頁138-151。
- ²⁹ 《清會典事例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本，1991年），第九冊，卷七二四，〈刑部·名例律〉，頁13。
- ³⁰ "The Districts of Hongkong and the Name Kwai-Tai-Lo", *The China Review*, No. 5 (1873), 334.
- ³¹ 王韜，《甕牖餘談》（據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版影印）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9年），卷三，頁十三。王韜〈香港論略〉亦記：「每歲中元，設有盂蘭盛會，競麗爭奇，萬金輕於一擲。」見氏著，《弢園文錄外篇》（沈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263。
- ³² 〈蘭盆勝會〉，《申報》，1876年9月5日。
- ³³ 香港大學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，（<http://www.hku.hk/sociodep/oralhistory/2/2.2.1.3.html>）。
- ³⁴ 丁世良等編，《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·中南卷（下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701，742及807。
- ³⁵ James Hayes, *The Hong Kong Region, 1850-1911* (Hamden: Archon Books, 1977), 73. 但Charles J. H. Halcombe的遊記中，1890年代文武廟的巡遊已見有類似飄色的裝置。參見Barbara-Sue White, *Hong Kong: Somewhere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6), 130.
- ³⁶ 林忠佳等編，《〈申報〉廣東資料選輯》（廣州：廣東省檔案館申報廣東資料選輯編輯組，1995年）。